

# 自由主义和平论再批判:逻辑悖谬与当代转向<sup>〔\*〕</sup>

赵银亮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自由主义和平论远非本质主义者所强调的是一套内部高度认同的价值理念。西方当代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并不是贸然出现的对于自由主义秩序和理念的应激性反叛,而是部分欧美精英和大众百余年来对于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的抗争。基于全球挑战可能引发的国际社会跨国动员和国内社会动员,推动着我们深入思考新时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转型路径。这一转型并非遥不可及的想象,而是新时代自由主义所遭遇的自觉形成的一种反向力量。未来全球和区域秩序的塑造,显然将取决于两种不同力量在多层面的博弈。

〔关键词〕自由主义和平论;民族国家;后本质主义;范式之争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9.020

从多学科角度推进自由主义和平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乃在于能否形成若干基本范畴,并以这些基本范畴对相关议题展开统摄全局的诠释。而东西方文明史变迁这一范畴正是诠释和把握自由主义和平论的有效分析工具之一。这一范畴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系统论述,若将其置于整个人类精神与物质发展的总体视野之内,也能在一个相对综合、比较、验证的学理基础上进行客观诠释。<sup>〔1〕</sup>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衰起落与欧洲文明和帝国兴衰同步,当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作为西方意识形态核心的传统自由主义的相对衰落,则是在世界文明

体博弈互动中值得观察的逻辑现象。

## 一、问题的提出及学术创新

(一)作为思想史研究的自由主义和平论

无论是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视角进行全景透视,还是从民族国家制度变迁的视角展开比较分析,抑或是从全球化和区域化演进的视域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思考,国内外学界已有丰富的学术积累,体现出以下研究旨趣和特点:其一,运用“比较—结构”方法进行研究是较早的尝试,也即从不同历史时段背景和条件下的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不同民族国家传统治理模式、不同文明所处的独特区位性等方面的差异,探寻自由主

作者简介:赵银亮,法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海上丝路视域下中国对外话语构建策略研究”(2019GJB007)的阶段性成果。

义思想的萌生及发展;其二,世纪之交以来,以国家制度转型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知识谱系为研究指向,以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为政策旨归而展开的系统性考察与比较研究渐次展开;<sup>[2]</sup>其三,普遍关注国家主导理念演进过程中思想史的传递、演绎,特别是自由主义若干关键范畴的承继与缺失,及其对于当前自由主义理念和实践变迁的深远意义;<sup>[3]</sup>其四,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研究方法似乎并不局限于纯学术讨论,业已开始将新兴发展中国家与西方霸权国家之间的治理理念置于合作与竞争的进程中加以考察。进一步说,传统的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探究,不仅局限于国际关系理论、文明史和经济发展论域,而是更加深远和广泛地将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路径加以勾连,深刻剖析新的全球情势下自由主义思想所面临的困惑和挑战。<sup>[4]</sup>

正如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名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所指出的,“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sup>[5]</sup>晚近几十年,自由主义思想史演变研究,作为制度“圭臬”的自由主义思潮总体发展研究,以及对国家制度变迁与全球化、区域化等的相互关系的探讨,指出当代自由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世界观的勃兴,是导致对自由主义和平论提出质疑的深刻思想基础;美国、俄罗斯、欧盟和中国等全球、地区及国家层面话语叙事议程的重构,则构成了自由主义和平论演变的实践动因。至于随着右翼势力在欧洲、美洲等地区 and 国家的崛起,并以此牵动自由主义理念的现时代演变,以及由此引发的欧美国家制度建设、思想建设和对外关系重组,乃成为自由主义和平论演变的现实基础。这些深层次、或明或暗、相互激荡又相互制约的背景和实践,使得自由主义和平论陷入深深的困境,欧美等西方国家精英也在数百年政治实践和世界重构中折冲徘徊,

在迷茫与失落中演绎着新时代自由主义理念的地区实践。

## (二) 比较研究视野下的自由主义和平论

1970年代以来,对于自由主义和平论的研究取得不小的进展。<sup>[6]</sup>无论是对具体因果关系的探究,还是来自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乃至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门类的分析;也无论是当时政治、商业精英阶层的回忆与反思,还是来自普罗大众、民间社会的粗浅记忆,这些方面提供的信息和理论拷问,足以使我们对自由主义起源及其发展脉络有一整体把握。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这一思想兴衰起落的复杂过程,是否还可以有更多超越单一学科、单一现象或单一国家(国家联盟)的知识性、主导型话语表达和解释?是否应该着眼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缘等因素的复杂互动来进行系统考察?

在这里,恐怕不得不强调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当今世界依然处于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东西方文明交融与竞争状态,这决定着文明单位、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基本立足点,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于西方文明的学习和模仿迄今为止依然是不少国家的现实选择。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罗代尔强调,长时段较之短时段的观察和研究,对于分析自由主义等思想和历史问题、现实问题更加重要。<sup>[7]</sup>将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对于自由主义和平论的分析,为学界提供了相当必要,同时又充满挑战的学术研究路径。

从历史的角度看,值得探讨的还有:当世界对于1980—1990年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实践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开始提出质疑乃至批评时,西方政治精英们如何看待他们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和平论?作为西方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制度性政策旨归,自由主义和平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明形态?如果说自由主义理念与和平诉求两者之间有相互关联的话,那么该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地遭遇的阻击和失败,又将如何评价这一思想的发展路径和未来前景?

诚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并非仅仅通过深入

的学术讨论就可以完成,更重要的是当今时代对于新的思想的呼唤、对于新的地区问题和挑战的有效回应。目前西方精英所担心的不仅仅是上述思想和理念所遭遇的普遍质疑和反对,也不仅仅是二战后数十年全球化和区域化累积所达成的制度性成果和政策实践,他们更忧虑的是新形势下被其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和平论的深度瓦解,以及长久以来他们所推崇的经济相互依赖对于促进和平的美好期待的破灭。事实上,对于自由主义和平论所引发的争议已不仅仅局限在欧美等大西洋地区,这些争论及其引发的共鸣已广泛地波及世界各地。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所强调的,面对新的形势,全球应一致“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因为“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sup>[8]</sup>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断揭示了西方自由主义和平叙事中的深层次矛盾,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 (三)自由主义和平论研究值得关注的最新进展

需要从学理和实践中进一步追问的问题还有:面对数百年尤其是晚近几十年来西方自由主义所取得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超越民族国家,在建构世界市场和全球秩序均取得进展的大背景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当代崛起又有着怎样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归?几十年来,究竟是怎样的制度环境和土壤,逐渐孕育、催生欧美国家内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勃兴,在这一过程中又聚集着怎样的文明思想的精神求索,尤其是如何改变着包括以宗教、哲学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与行为习俗及其表征体系,而这些对欧美精英思想和国家制度设计的建构具有深刻影响。欧美等西方精英思想认知的改变,与其说是对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审视与反思,不如说,欧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勃兴,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制度形态和思想理念的调整是自由主义制度演变的必然逻辑结果。西方当代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兴

起,以及对于自由主义秩序和理念的应激性反叛并不是贸然出现的,而是部分欧美精英和大众百余年来对于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的抗争,这一前赴后继的学习和反思过程构成了对于自由主义保守论者的“反向运动”(counter movement)。欧美自由主义保守论者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大众力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恐怕无法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全球化和区域化来解决。<sup>[9]</sup>

学界关于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有着可观的进步。虽然对“自由主义”这一现象本身的定义汗牛充栋,有数不尽的不同见解,但是依然要沿循数百年来不断嬗变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进行界定和思考。为了厘清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嬗变逻辑,首先需要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学术起源和政策旨归进行剖析。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思想谱系的起源和应用主要受到三大学术研究思想范式的影响:一是深受波兰尼和葛兰西学术思想影响,对二战后美国霸权衰落,自由主义实践的“反向运动”,以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勃兴的理论反思;<sup>[10]</sup>二是自1970年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在全球秩序转型背景下对全球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审视;<sup>[11]</sup>三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地缘政治分析范式,进一步说,源于自由主义和平思想的地缘政治学批判性思考。<sup>[12]</sup>由上述三种思想谱系所阐发的自由主义思潮及实践,为深入思考自由主义在历史和当今现实中的发展逻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研究进路。但仍需指出的是,以民族国家发展为关注重点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对于世界各国政治发展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等相关性的思考,并未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对当代民粹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因也未能提供有效的理论思考。

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把对自由主义和平论的研究置于全球转型,尤其是东西方国家间的互动过程中进行,力求通过对事实与理论的反思,为这一领域的学术范畴与理论工具的构建提供参照与铺垫。首先,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和平概

念进行阐释和剖析,在此基础上对自由主义思潮的方法论和本体论进行研究,探析其对于不同民族国家发展、国家间冲突和政治建构等方面的政策旨归;<sup>[13]</sup>其次,揭示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全球化、区域化对于民族国家政治结构和市场体制转型的牵引及重构,探讨这一重构对于民族国家精英和大众利益调整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最后从全球秩序重组的角度,研究在自由主义思潮指引下全球制度的失序和失范,以及走向新秩序的逻辑和路径。<sup>[14]</sup>显然,正如波兰尼所主张的,以自由主义为依归,希冀通过充满矛盾和不平等的全球市场自然带来和平的曙光,或所谓资本主义式的和平,恐怕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奢望和幻想。而更大的可能性则是,本质上无法顺应时代发展的逻辑悖论所制约的西方自由主义实践,最终只能导致民族国家内部强烈的反制和对抗。<sup>[15]</sup>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的反制或对抗,经由影响民族国家精英和大众对于威胁和挑战等认知的深层次调整,加速民族国家中的民粹主义回归,进而增强民族国家对于“他者”、国际秩序或全球主义的疑虑。

## 二、多学科视角下的自由主义和平论: 研究范式与逻辑进路

二战以来,对于自由主义和平论的研究更多是沿循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假设和逻辑,作为对这一古老话题的思考,似乎从国际关系学科产生以来就一直被看作其中的核心概念和关注点,这一叙事角度已包含着“比较—结构”分析的一些要素。

### (一)“比较—结构”方法的研究尝试

从文明构成的要素——各民族国家及其文明的相互结构关系中进行考察,对于自由主义和平论的研究尤为必要。千百年来,对和平的追求是国际关系学界亘古不变的研究话题,但对于和平的概念阐释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将“和平”简单理解为国家间不存在明显的暴力或冲突,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以国家为基础

的和平可能面临哪些挑战。<sup>[16]</sup>1980年代以来,由国际政治学者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引起的热议、由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引发的思考,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界有关霸权兴衰周期理论的讨论等,都推动着后霸权时代自由主义和平论的学术交锋。<sup>[17]</sup>

把自由主义和平论置于国际关系学的视域中进行观察,所引发的争论主要围绕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展开。两种范式的命题、视角、方法和逻辑假设有较大差异,由此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流派。传统现实主义者基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前提假设,认为国家间的暴力冲突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生存的应有之义,其研究重点是围绕权力和利益而展开的国家间政治的发展逻辑,国家的生存之道即在于争取自身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强调由于“权力的转移”可能带来的全球秩序重构及对世界的破坏性影响。在他们看来,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它们将着力寻求扩大全球影响力,由此必将带来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局面。<sup>[18]</sup>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原理亦持有类似观点,他们同样认为安全是国家追寻的主要目标,引发冲突的根源主要在于区域性的权力不平衡,为此需要竭力维持国家间权力的均衡性以防止冲突的发生。<sup>[19]</sup>

自由主义研究者对于和平与冲突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厚的学术积累,其学术观点也引起了多方重视。在他们看来,现实主义学者的诸多假设无法超越旧的传统思维和历史时空,许多论断并不符合当下国际政治现实。自由主义论者普遍倾向于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他们的学术思想也同样借鉴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及约翰·密尔的主张。<sup>[20]</sup>自由主义论者强调经济相互依存的重要意义,尽管对于相互依存的程度和形式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他们普遍认为随着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深和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将能有效避免国家间的大规模冲突。<sup>[21]</sup>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制度建设、规范

建设,以及不断推进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对于国家间利益和权力之争必然有着较大的制度约束,能够有效增进和平前景。<sup>[22]</sup>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间能够实现和平的主要理论假设是,“全球自由化的市场”代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国家之间建立密不可分和平联系,<sup>[23]</sup>即全球化的发展能促进和平的实现。<sup>[24]</sup>

## (二)“比较—结构”方法的实践及困境

在传统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民族国家努力寻求在世界权力体系结构中的定位和身份。无论是数千年来亚洲东部原生态的轴心文明的中华体系,还是自古以来处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俄罗斯文明,抑或是处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两河流域文明,如万花筒般在东西方的历史时空中持续地交织和抗争。不同文明国家沿循各自的历史惯性和发展实际,积极应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带来的严峻挑战。如果进一步从实证的角度对自由主义和平论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收益”逻辑:西方国家通过制度建设提升成员国参与区域制度合作和全球化市场合作的机会成本,在此基础上又借助相对严谨的法律框架对市场化主体进行规范和约束,进而实现理想中的贸易自由化,<sup>[25]</sup>并由此衍生制度约束下的“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sup>[26]</sup>

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通过世纪之交以来一系列自由化举措和国际组织准入等政策工具,西方世界有序推动了中国、俄罗斯等国有有机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国家高举所谓的自由主义大旗,借助市场化和全球化等手段,试图将中国、俄罗斯等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和安全战略之中,认为其可以进一步抑制国家间爆发剧烈冲突的可能性。<sup>[27]</sup>他们强调,国家间战争与冲突的逻辑是可以被打破的,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对于和平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建构世界市场的方式来实现。西方学界和政治精英坚信,通过全球化市场中的社会化学习,可以推动世界不同体制的国家实现向所谓自由民主制度

的转向,也能够引领世界走向真正的“历史的终结”,从而实现维护西方自由主义霸权的目标。<sup>[28]</sup>从二战以后世界各地的发展实践来看,不少国家似乎也正是沿循自由主义指导的市场化导向、民主化建设这一逻辑,完成了国家政体的演变和经济体制的转型。毫不讳言地说,这也正是西方霸权国家长期以来所遵循的全球治理和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改造的理论根基。<sup>[29]</sup>

然而,晚近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从“颜色革命”到克里米亚战争,从中东乱局到俄乌冲突,自由主义者所描绘的路线图和福山的预言从未真正实现。把自由主义和平思想作为一个文明单位来系统考察,进而观察其走向和内在逻辑及动力,更能够真切、科学且全面地透视该思想所面临的逻辑困境和现实挑战。尽管数十年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以及其中蕴含的市场一体化、资本自由化等理念,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世界主要国家和行为体的联系,并为西方国家精英阶层、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带来了丰厚的制度红利;但同时也应看到,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精英和集团手中,许多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加剧、族群分裂、社会撕裂,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制度风险及脆弱性。<sup>[30]</sup>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和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去欧洲化趋势、2022年俄乌冲突等一系列迹象表明,自由主义理念指引下的全球市场发展日益呈现不平等、不稳定和不安全态势,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抬头,这些态势都可以被解读为应对全球市场一体化而对世界不均衡发展的自然反应。在某些政治势力的影响或鼓动下,这一“自然反应”可能将矛头和不满情绪指向国际社会的“他者”,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的撕裂,摧毁国际社会为应对复杂的地区危机和全球冲突艰难形成的合作共识,并最终为全球和平前景蒙上阴影。<sup>[31]</sup>

从全球资本的对外扩张与民族国家自身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看,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曾提出过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命题,那

就是“过度扩张必然败亡”。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数百年扩张,还是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和平论的实践,都要与特定时期国际社会的根本发展方向和普通大众的发展诉求相契合。自由主义论者试图通过加强全球市场一体化来湮灭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滋长的根源,进而抑制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但其“美好”的设想背后却忽略了普通大众的基本诉求。此外,西方自由主义和平论未能充分考虑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内在矛盾,也未充分关注不同民族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竞争性和内在制约性。<sup>[32]</sup>

从历史维度观察,容易被自由主义者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二战后发生的大多数军事干预往往是针对那些退出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勇于探索自主化发展道路国家和地区。二战后一段时期部分中东欧国家、东亚和拉美国家自主探索本土化现代化道路,追寻适合自身的国家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由此遭遇了大规模的军事干预或经济制裁。另有部分国家则与西方结盟,被迫融入西方自由主义指引下的自由贸易体制,以获取优惠的市场准入、技术转让和贸易拓展。通过对上述两种不同的路径进行考察,基本能够明晰自由主义和平论内在的逻辑悖论,究其实质,所谓的自由贸易体制即是西方国家为维护霸权和自由主义市场秩序而精心设计的全球战略议程。

同样需要引起关注的一个现实是,近年来那些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旗手和全球化支柱的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非自由主义发展的趋向。在部分欧美国家,反对派精英谴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并通过散布全球化加剧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全感等论调,极力煽动公众的不满情绪。在美国、法国和部分北欧国家,民粹主义右翼力量更是高举反对全球化的旗帜,引领公众将矛头指向国内少数族裔和全球贸易失衡等问题。尽管在部分观察家看来,欧美等国所面临的上述社会动荡与当下全球经济危机存在某种关联,但我们从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西方政治精英的话语叙事正在经历深刻嬗变,即通过将传统的政

治偏见与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相捆绑,以实现其隐含的政治目的。

通过对近年来欧美等国内部精英和大众思想变迁进行全景透视,是否可以认为,当前欧美国家所呈现的针对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兴起,并非对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全球化发展道路的背离,而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化、全球化支撑的技术保障体系所推动的世界市场整合的直接后果。

此外,面对复杂的全球发展态势,欧美国家传统的中左翼政党未能针对社会撕裂和迷茫时代提供可供操作的应对措施,又进一步推动着欧美国家的右翼力量探寻摆脱危机的新道路。<sup>[33]</sup>很大程度上,这些右翼力量将会继续沿循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发展思路,推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话语叙事转型,这一转型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族群割裂,催生社会的不满情绪,最终导致对国际社会中的“他者”的仇恨与拒斥,进而加剧国际冲突。

### 三、如何筑牢和平的篱笆:一个政治隐喻

面对西方自由主义和平论引发的种种理论困惑和实践悖论,各国进行了多样化的“反向运动”新尝试,依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作为载体所呈现的民族国家精英叙事方式的变革,折射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试图冲破自由主义和平论藩篱的无奈选择。主流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是否可以预测国家与社会关系合乎逻辑的当代转向?如何解释波兰尼所谓的“反向运动”与全球市场内在的不平等和风险性、脆弱性?这些问题都需要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进行思考,需要结合不同行为体参与经济政治活动和社会冲突的多样性来进行分析。

#### (一)全球化时代自由主义和平论的现实困境

基于上述理论假设可以观察,新的时代背景下,由全球化及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冲突风险如何从国家层面推进到个体层面,而由单一个体组成的社会组织又承担了全球竞争性市场一体化带

来的风险代价,从而为国家间政治精英的决策共识奠定社会基础,并进一步重组全球经济架构。<sup>[34]</sup>当前由国际关系理论引发的“领土陷阱”依然无所不在。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遵循的民族国家主权的美好愿望仍然是从未完全实现的乌托邦想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决策的本体论依归(ontological fixation),在世界局部面临国际冲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sup>[35]</sup>

从议题领域来看,包括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和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很大程度上对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治理体系构成严峻挑战。与此相关的是,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进程中。那么,随着国际社会行为主体的深刻变化,应该如何界定新时代的“和平与冲突”内涵,是否可以将“和平”定义为没有明确指向国家行为体的暴力活动?由此或将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我们是否依然局限于传统国际关系对于“和平”概念的解读,是否继续将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关键或主要行为体,并继续加强国家与国际体系的传统结构关系,而忽略非国家行为体在维护和平秩序中的作用?换言之,我们是否认为国家仍然是全球化时代跨国生产和市场运行的最有效工具,国家主义模式是全球化时代最有效的治理模式?如果循此模式推理,就不难理解自由主义者为何极力避免对市场主体次序的重新组合,进而希冀降低全球化时代发生政治经济冲突的风险。

问题的关键在于,日益复杂的、以网络化呈现的全球化市场图景逐渐被扁平化为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国际行动,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由统一的世界市场所带来的多维度的冲突余波(multi-scalar violent repercussions),也就无法实现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对和平与安全的期许:因为单一维度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思维范式,剥离了对于民族国家内部不确定性社会结构、多样态文化环境的评估。<sup>[36]</sup>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全球化时代的一体化发展能够为民族国家构筑

起一道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和平篱笆。<sup>[37]</sup>这一隐喻契合了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理念:当国家主权没有受到直接挑战时,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和平与战争的理解容易忽略潜在的冲突风险,而全球化时代的跨国投资被自由主义者视作国家间相互依存的表征,统一的市场也被看作为和平而投入的重要筹码。

(二)国内—国际双层博弈框架下的自由主义和平论

新的全球形势下自由主义的乐观期许已然遭遇挫折。跨国资本的强势突击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和社会鸿沟,由此也催生出不同形式的冲突。研究种族冲突的政治人类学家约翰·纳格尔(John Nagle)强调,如果对一个民族国家进行整体性的经济重构,那么其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剥夺普通大众的土地资源,且无法提供可以替代的解决方案,这不仅可能破坏民族国家传统的经济体系,而且极易引发民族国家社会层面对于自由主义倡导的全球化的强烈抵制。<sup>[38]</sup>随着全球市场的重组,民族国家将产生大量失业群体,这将成为孕育民粹主义勃兴的群众基础,从近年来加勒比地区的实践中可以窥见一斑。<sup>[39]</sup>显然,欧洲和拉美地区出现的社会动荡和经济乱象,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衍生品。

从实践来看,新自由主义并非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导,而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国际组织的政治精英基于既定目标和特定利益而开展全球治理的意识形态,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必将出现的行动指南。<sup>[40]</sup>数百年世界经济实践的表明,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指引下快速融入全球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们不断受到“华盛顿共识”和国际资本的钳制和束缚,失去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民族国家不得不在全球层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展开竞争,很大程度上也被迫通过经济体制和社会层面的转型实现对全球市场的无奈参与。<sup>[41]</sup>民族国家着力推进体

制转型,不仅体现着政治精英对于新自由主义道路的无奈遵从,也体现着政治精英被迫在全球资本和国内社会阶层之间寻求脆弱的平衡。<sup>[42]</sup>针对特定情势而进行体制转型的必然结果是:民族国家无法有效地保护本国民族工业和普通大众使其免遭外部威胁,最终只能不断强化对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权益的袒护,从根本上反而加剧了国内社会的不平等与不稳定。<sup>[43]</sup>近年来带有极大破坏性的新自由主义案例还体现在环境治理、移民治理和气候变化等领域,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的背后通常体现着资本的逻辑。随着资本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扩张,其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源无序开采对于环境的破坏,而且也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纳入资本的全球扩张进程之中。<sup>[44]</sup>

对自由主义和平论思想及其实践进行客观评判,需要透过“国际—国内”双重博弈的视域展开。自由主义思想和理念的实践难以离开的一个重要背景,也即特定各国的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sup>[45]</sup>从数百年来自由主义思想的实践来看,自由主义世界体系所带来的全球文明的急速演进与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及代价,乃是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实践同一过程中的两个侧面。民族国家在经由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并将自身发展融入世界大潮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在全球发展大潮中推动政治变革的精英和大众。如果说,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肇始阶段,民族国家的自由主义精英阶层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增进国民福利的方式来遏制民众最初的犹疑或不满,那么,在经历一次次全球资本出于战略利益的考量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进而给公众带来伤害之后,民族国家内部必将逐渐孕育形成对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反向运动”。可以说,这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面对外部挑战时自然而然形成的决策“重新政治化”的过程。<sup>[46]</sup>

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西方政治精英也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们试图通过制度性变革来遏制自由主义所带来的负外

部性,固守自由主义理念,希冀提供新的公共物品,并开启一系列政治辩论和政策实践。正如西方颇具威望的文化史大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在其《从黎明到衰落》这部西方文明史巨著中谈到的,“20世纪即将结束。进一步深究后,还会发现西方过去500年的文化也将同时终结。有鉴于此,我认为现在正是恰当的时候,应该依次回顾一遍我们这半个千年来伟大卓绝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sup>[47]</sup>从巴尔赞的逻辑中可以看出,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的反思,不仅应该从全球各国的实践来观察,而且需要对整个西方文明兴衰的长时段同时进行探讨,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不仅在欧美等发达西方国家,而且在拉美、亚洲和非洲等地,精英们高举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大旗,重新擘画民族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话语叙事模式。这一话语叙事模式的特征,是以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核心,将社会危机的责任和矛盾推向外国势力和国际移民,巩固国内政治统治基础。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新的民粹主义倾向将西方自由主义引发的市场暴力与国内不断渲染的移民威胁相结合,将矛盾指向国际社会中的“他者”,或将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的撕裂。

#### 四、开辟自由主义和平论的后本质主义研究空间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民族国家政治进程的演变,关于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讨论恐将继续深入下去,未来一段时期关于自由主义和平论所面临的时代挑战仍将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政治学者菲利普·塞尔尼(Philip Cerny)在1998年曾指出,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普遍的不安全感,呈现出类似“中世纪持久混乱”的场景。塞尔尼的论调在某种程度上与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看法不谋而合,这位西方左翼史学大师在2010年接受《新左翼评论》采访时也强调,美国谋求建立世界单极霸权体系梦想破灭,国家权力在丧失,中东欧地区政

治极端右倾明显,自由主义秩序面临极大挑战。<sup>[48]</sup>全球化时代,由于全球市场和资本的快速扩张,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决策实践逐渐融入西方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更加广泛的全球决策体系之中,但需要强调的是,当下的全球决策机制和体系越来越难以产生有效的、权威的和多功能的治理架构。<sup>[49]</sup>

针对西方自由主义带来的全球生产要素的急速扩张,以及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所展开的一系列争论和冲突,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精英不得不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基于不确定的全球化发展态势和不稳定的地区局势,民族国家积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并通过对外对内话语叙事方式的变革,应对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和外部挑战。令人忧虑的是,部分西方国家政治精英习惯于立足阶级分析的视角,将国内社会危机或社会矛盾的根源指向外部的“他者”,这些精英以一种令人不安的叙事方式取代多年来鼓吹的全球化论调,为国家间冲突蒙上了阴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是通过夸大外部威胁的方式,将新民粹主义思想融入美国国家对外战略尤其是贸易政策之中,以此掩盖西方自由主义制度面临的窘境和困惑,同时也加大了本国“应激性民族主义”(reactionary nationalism)的负面影响。

通过对近年来欧美乃至全球所出现的针对西方自由主义的重新审视,基本能够厘清从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向新自由主义思想、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学术转向逻辑。这一转向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和平与冲突的固有理解范式,着重从社会转型角度揭示了全球新自由主义思想可能带来的深刻变化。从经济层面来说,几十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国际社会族群的撕裂和部分转型国家面临的制度困境,已经表明了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市场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存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无力和悖论,而卡尔·波兰尼所提出的针对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则较为科学地解释了全球市场一体化与国内政治经

济结构调整的密切关联,也揭示了部分国家反自由主义思潮勃兴的深层社会根源。

从最新学术成果来看,围绕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现实挑战和未来走向,不少学科领域的比较研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事实上,伴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扩张,全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等持续关注全球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多方面影响:一方面,他们从不同学科视野,研究全球化所带来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自由贸易协定对于国内就业的影响、跨国资本对于全球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学者还关注在全球化和西方自由主义面前民族国家所遭遇的苦痛和挣扎、迷茫和无奈,他们运用多学科的工具探索精英和大众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认知变化及根源。<sup>[50]</sup>与此同时,另有部分国际关系学者依然忽视自由主义内在可能蕴含的冲突风险,他们更倾向于将全球市场一体化与减少冲突、缔造和平联系起来,鼓吹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继续加强全球层面合作。

由此,对于自由主义的和平论断呈现出立场鲜明的二元论: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和平论的立场,另一方面是基于市场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视角,研究国际贸易和国内政治、国际和平的关联。这些学术争论犹如“学科间新自由主义”范式之争:一类是介于西方经济学视域下的自由主义和平论思考,另一类是介于经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和平论域。<sup>[51]</sup>

不可否认,在全球化视域下,西方自由主义的未来发展必将遭遇跨越民族国家的国际社会多元进步力量,必然要直面国内民族主义的全面审视。基于全球挑战可能引发的国际社会跨国动员和国内社会动员,推动着我们深入思考新时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转型路径。<sup>[52]</sup>这一转型并非遥不可及的想象,而是新时代自由主义所遭遇的自觉形成的一种反向力量。未来全球和区域秩序的塑造,显然将取决于两种不同力量在多层面的博弈。

围绕自由主义和平论所展开的辩论,对于国

际和平与文明研究所能产生的最大贡献,也许是沿着当代文明学者批评亨廷顿本质主义文明观的路径走下去,化解本质主义“自由主义和平论”。<sup>[53]</sup>后本质主义书写自由主义和平论的研究方法能够打破国家行为体的认知局限,使得国际社会对于和平属性及路径的理解能够成为共有知识,而不仅仅是强调汤因比提出的不同文明间“挑战—回应”的认知逻辑,抑或是沿袭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99年题为《东方和西方》的诗里开篇提出的东方和西方永远不会相融这一思想。开辟关于“自由主义和平论”新的研究空间,尤其是在国际关系和平研究领域开启后本质主义研究道路,或许是世界政治中的持续文明对话将来能够产生的最高学术成就。

## 五、结论与讨论

从思想史和文明史的角度探讨西方自由主义和平论,将文明的长时段演进、短时段变化彼此结合起来考察,可以看到当前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在具体事件观察中无法厘清的深层结构和现象。从文明传承中的恪守与创新、文明交流过程中的互鉴互学,一直到对自身民族文明传统的守护与反思,所有这一切,通过东西方观念形态的构建、价值标准的选择、具体制度的创设,都曾深深地影响着全球化时代国家对于和平前景的美好期待。<sup>[54]</sup>一个越来越多样化和多极化的世界,对于这一既事关全球价值,又涉及各国利害关系的重大问题不可能不存在争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与和平问题的态度立场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sup>[55]</sup>

正如著名政治学者彼得·卡赞斯坦指出的,“多元性和多维性这两个概念是对当今文明政治的最好概括”,<sup>[56]</sup>自由主义和平论亦远非本质主义者所强调的是一整套内部高度认同的价值理念。在当下多元和多维的世界政治中,人类对于和平之路的孜孜追求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并不在于不同文明、不同主体独有的文化内聚力和孤立性,而在于不同文明和主体间的多元性,在于

彼此间的接触和交往。正如研究文明身份的学者所强调的,当下由不同文明构成的群体可能会产生一种“涉他”(other-regarding)身份,这种身份有助于强化文明之间的和平。

对于自由主义和平论内在逻辑的批判,需要将系统理论和经验事实这两个方面统合到一个研究框架之中:既要研究相对开放的跨文明接触和行为体交往,又要分析相对有限的个体行动与群体实践范畴。如何揭示自由主义和平论这一国际关系属性本体论内在的“一般线性现实”的逻辑悖谬,转向运用过程本体论和科学本体论,注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结构域境下对于和平实践的研究,恐怕是未来深化学术对话的重点方向。

### 注释:

[1] 参见[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四版)》,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2]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96页。

[3] [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8-123页。

[4]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0-123页。

[5]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6] 参见[英]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7]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全三卷,顾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81页。

[9]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10] Gonzalez - Vicente, R., & Carroll, T., "Politics after National Development: Explaining the Populist Rise under Late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s* Vol. 14, No. 6, 2017, pp. 991 - 1013.

[11] Harvey, 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pringer, 2005; S. Violent, *Neoliberalism: Development, Discourse and Dispossession in Cambod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12] Agnew, J., & Corbridge, S., *Mastering Space, Hegemony,*

*Terri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5; Flint, C., *Geography of War and Peace*. In C. Flint (eds.), *The Geography of War and Peace: From Death Camps to Diploma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 - 15; Koopman, S., "Geographies of Peace", *Oxford Bibliographies* 2016; McConnell, F., Megoran, N., & Williams, P., *Geographies of Peace*, London: I. B. Tauris, 2014; Megaron, N., "War and Peace an Agenda for Peac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30, No. 4, 2011, pp. 178 - 189. Nagle, J., "Nostrum or Palliative Contesting the Capitalist Peace in Violently Divided Societies", *Civil Wars* Vol. 12, No. 3, 2010, pp. 218 - 236; Williams, P., & Mc Connell, F.,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Peace", *Antipode* Vol. 43, No. 4, 2011, pp. 927 - 931.

[13] Agnew, J., "The Territorial Trap: 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1, 1994, pp. 53 - 80.

[14] Cerny, P. G., "Neo Medievalism, Civil War and The New Security Dilemma: Globalization as Durable Disorder", *Civil Wars* Vol. 1, No. 1, 1998, pp. 36 - 64.

[15] 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6 - 445页。

[16] Galtung, J.,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 No. 3, 1969, pp. 167 - 191; Richmond, O. P., "Pea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O. P. Richmond, S. Pogodda, & J. Ramovic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Disciplinary and Regional Approaches to Pea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57 - 78.

[17] 参见[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

[18] Mearsheimer,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 2014.

[19] Waltz, K.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rton & Company, 1979.

[20] Doyle, M. W.,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1986, pp. 1151 - 1169; Howard, M. E., *War and the Liberal Con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Johnston, A. I.,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 - 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Keohane, Robert O, & Nye, J. S.,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21] Mansfield, E. D., & Pollins, B. M., "The Study of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 6, 2021, pp. 834 - 859.

[22] [美] 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于杨杰译,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5年。

[23] Gartzke, E., "The Capitalist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1, 2007, pp. 166 - 191; Richmond, O. P., *Pea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on: Routledge, 2008, p. 23.

[24] Gartzke, E., & Li, Q., "War, Peace, and The Invisible Hand: Positive Political Externaliti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 4, 2003, p. 562.

[25] Moravcsik, A.,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Compromise and the Neofunctionalist Lega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5, Vol. 12, No. 2, pp. 349 - 386.

[26] 嵌入式自由主义原则在战后欧洲主要体现在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其理论奠基者是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有德国经济学家沃尔特·欧根(Walter Eucken)和法学家弗朗茨·伯姆(Franz Bohm)等,参见 Vicien A. Schmidt/Mark Thatcher (eds.), *Resilient Liberalism in Europe's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14.

[27] Funabashi, Y., Oksenberg, M., & Weiss, H., *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 A Report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1994.

[28] Fukuyama, 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Y: Free Press, 1992.

[29] Campbell, S., Chandler, D., & Sabaratnam, M., *A Liberal Peace? The Problems and Practices of Peacebuilding* London: Zed, 2011.

[30] Anand, S., & Segal, P.,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Anthony Atkinson and Francois Bourguignon (eds.),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2A, 2015, pp. 937 - 979; Elsevier. Lynch, K., "Neo - liberalism and Marketisation: The Implic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Vol. 5, No. 1, 2006, pp. 1 - 17.

[31] Gonzalez - Vicente, R., & Carroll, T., "Politics after National Development: Explaining the Populist Rise under Late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s* Vol. 14, No. 6, 2017, pp. 991 - 1013.

[32] Blyth, M., & Matthijs, M., "Black Swans, Lame Ducks, and the Mystery of IPE's Missing Macro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4, No. 2, 2017, pp. 203 - 231; Carroll, T., & Gonzalez - Vicente, R., "From New Deal to the Art of the Deal: How the Neoliberal Project Led to Trump", *The Conversation*, 2017, January 2.

[33] [美]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 - 11页。

[34] Beck, U., *World Risk Society*, Malden: Polity, 1999.

[35] Agnew, J., "The Territorial Trap: 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1, 1994, pp. 53 - 80; Mitchell, T., "The Limits of the state: Beyond Statist Approaches and Their Cr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1, 1991, pp. 77 - 96.

[36] Galtung, J.,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Thousand Oaks: Sage, 1996; O. P., *Pea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on: Routledge, 2008, p. 89.

[37] Koopman, S., "Let's Take Peace to Pieces",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30, No. 4, 2011, p. 194.

[38] Nagle, J., "Nostrum or Palliative Contesting the Capitalist Peace in Violently Divided Societies", *Civil Wars*, Vol. 12, No. 3, 2010, p. 232.

[39] Pantin, D. A., *The Challenge of Youth Unemployment in the Caribbean: The Role of Youth Employment Training Programmes*, Port of Spain: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Caribbean Office, 1996.

[40] Larner, W., "Neo-liberalism: Policy, Ideology, Governmentality",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 63, No. 2, 2000, pp. 5 - 25.

[41] Jessop, B.,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2002.

[42] Gill, S., "Globalization, Market Civilization, 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3, 1995, pp. 399 - 423.

[4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44] Gonzalez - Vicente, R., "South - south Relations Under World Market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 the Elusive Promis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hina - Ecuador Resource - development Nexu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4, No. 5, 2017, pp. 881 - 903; Kaag, M., & Zoomers, A., *The Global Land Grab: Beyond the Hype*, London: Zed, 2014.

[45] [美] 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姜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46] Gonzalez - Vicente, R., & Carroll, T., "Politics after National Development: Explaining the Populist Rise under Late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s*, Vol. 14, No. 6, 2017, pp. 991 - 1013.

[47] [美] 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

百年,1500年至今》,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作者的话”,第1页。

[48] Hobsbawm, E., "Barbarism: A user's Guide", *New Left Review*, Vol. 20, No. 6, 1994, pp. 44 - 54.

[49] Cerny, P. G., "Neo Medievalism, Civil War and the New Security Dilemma: Globalization as Durable Disorder", *Civil Wars*, Vol. 1, No. 1, 1998, p. 45.

[50] Cammack, P., "What the World Bank Means by Poverty Reduction, and Why it Matter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9, No. 2, 2004, pp. 189 - 211.

[51] Sandbrook, R., "Polanyi and Post - neoliber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Dilemmas of Re - embedding the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4, 2011, pp. 415 - 443.

[52] Gonzalez - Vicente, R., & Carroll, T., "Politics after National Development: Explaining the Populist Rise under Late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s*, Vol. 14, No. 6, 2017, pp. 991 - 1013; Sandbrook, R., "Polanyi and Post - neoliber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Dilemmas of Re - embedding the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4, 2011, pp. 415 - 443.

[53] 文明史研究者阿马蒂亚·森批评亨廷顿受到“一元幻觉”(illusion of singularity)的驱使,将集体身份视为行为体唯一的和不变的特性,并提出了本质主义文明身份观。参见 Amartya Sen,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pp. 45, 10 - 12。

[54] 张勇:《晚清“文明”论语境中的西方文明批判》,《学术界》2023年第1期。

[55] [德]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0 - 146页。

[56] [美] 彼得·J. 卡赞斯坦主编:《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6页。

[责任编辑:刘 鏊]